

五百年前的中國與世界

● 王廣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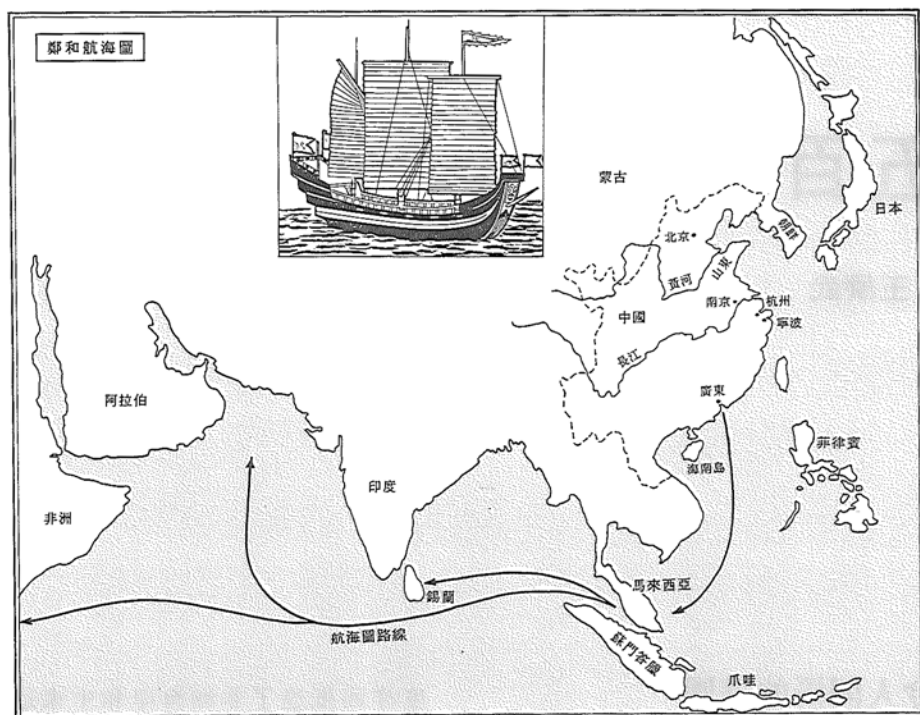
令人困擾的謎團

還是在近代以前，中國的海軍遠航隊就已在明朝永樂皇帝統治時期（1402-1424年）從長江口出發而到達了東非海岸。永樂的統治時期，至少是由於兩個原因而在世界歷史上佔有了一個特殊地位。第一個原因，當然是鄭和前往印度洋的著名遠航了，其中有六次是在永樂統治時期，第七次則是在他孫子的統治時期。第二個事件，至少在地緣政治方面值得注意，這就是永樂皇帝把首都從南京遷往北京的決定。儘管遷都與這裏的論題並不直接相干，但它在歷史上非常重要，反映了最終對其海軍發展產生了影響的中國政局。

對我們來說，如果從近代史的角度來審視這兩個事件的話，那麼鄭和的西洋之行就格外重要。自從十八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史中充斥着對海軍力量的記述，而在更早一些的歷史之中則還不是這樣。就這一背景而言，中國早在十五世紀就擁有了一支龐大的海軍，並受命渡越印

度洋而抵達了非洲海岸和中東這一點，就非同尋常了。如果還記得從那時以來海軍力量給世界歷史帶來了甚麼樣的結果，以及西方帝國如何主要就是由於海軍力量而把勢力擴展到世界各處並在兩個世紀中支配了近代世界的發展的話，那麼，中國也曾經擁有這龐大的海軍力量這一事實，無疑就將成爲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了。依然構成一個重大謎團的是這一事實：第七次西洋之行是在永樂去世九年之後受命出發的，並於1435年返歸，從此以後，中國海軍就完全退守於中國海岸了。在此我並不打算解開這一謎團。我僅僅準備利用這一事實，去評述中國對其海外世界的看法。

在討論之前，我想提及《河殤》。它的作者們提出了這一論點：十五世紀是至關重要的，因爲世界正面臨着一個選擇，這就是或者蜷守於陸地，或者是走向海洋。他們爭論說，對於中國，在1405年永樂皇帝下令鄭和領導的七次西洋之行第一次啟航之時，中國便面臨這一選擇了。但是西洋之行並沒有明確的經濟目的，他們僅僅



是爲了政治目的才受命登程的，並且在30年後就宣告結束了，因爲中國人無法克服其大陸心態。

《河殤》作者的觀點成爲中外學者探討這一歷史事件意義的一部分。當西方的中國學家得知中國曾經派出過越過了印度洋的海軍遠航隊的時候，他們大吃一驚；並且從這個世紀之初，就開始對這個被傳統的中國史學家普遍忽視了許多世紀的課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在十九世紀，中國人自己就已意識到鄭和下西洋一事的重要性了。魏源在1842年完成的《海國圖志》，重新開啟了對中國與海外諸國關係的關切。但此書的思路過於傳統，以致於不能對鄭和西洋之行的歷史意義，提供任何新鮮的闡說。

第一位撰文討論鄭和下西洋一事的意義，並探索它們爲何中止的中國學者是梁啟超。他撰了一部鄭和的傳記，以及一些有關中國的海外冒險者的文章。從此以後，中國人就開始撰文探討清朝末年中國的衰弱，探討它

在對抗西方的挑戰時的失敗，以及它在十九世紀發展自己的海軍力量上的失敗了。

所有這些都引發了一連串的問題，「假如中國人繼續進行海軍遠航，那麼會發生些甚麼呢？」或者「假如中國人繼續其航海活動，中國文明會走上另一條道路嗎？」這些疑問顯示，十五世紀之初在永樂年間所發生的那些事情，至今依然縈繞於人們腦海之中。它們構成了在此我打算討論的中國人心目中的海外世界這一問題的一個主要背景。

對外政策透視

1402至1424年永樂皇帝在中國外部的實際作爲，可以顯示他個人或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中國打算在其疆域之外做些甚麼或不做甚麼。那麼這些實際作爲是甚麼呢？首先，在永樂登上皇帝寶座之後，他就立即

派遣使節前往中國人所知道的世界遠方，去宣告他業已即位登極。這是確認他是其父親的合法繼承人而不是僭位者這一事實，並把其侄子大約三年半的統治時期從歷史上抹掉的一種手段。永樂的使節被派往朝鮮和日本；被派往沿邊的和遠居於今之蘇聯遠東地區的女真部落；被派往蒙古各部首領；被派往西藏、今天的新疆地區、吐魯蕃和撒馬爾罕，甚至遠及阿富汗和伊朗；被派往南方的使節，從陸路到達了越南，到達了雲南境內各個自主的部落以及雲南境外緬甸和老撾的各個獨立部落國家。使節們也從海上被派往東南亞，並經過馬六甲海峽抵達了印度。在派出第一批使節的三年之後，就出現了鄭和下西洋之事，其初次之航行是在1405年。

1402年10月的一道對前往日本、東南亞和印度的初訪使團的諭示，表明了永樂本人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他說①：

太祖高皇帝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諭之以誠；以其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

可以想像，並不是每一位外國君主都樂於接受這類語辭的。但是關於他們對永樂傳至的消息做何反應，還沒有發現甚麼記載。實際發生的情況是，大部分被諭告的國家，都確實派來了使節作為回訪。其中許多很快就來到了中國，另一些則是等到鄭和第二次帶來諭告之後才做出回訪的。當然，鄭和並非普通的使節，而是一支相當龐大的海軍遠航隊的長官。那可

能是東南亞和印度洋國家所曾見到過的最大的一支遠洋船隊了。那麼，諸位統治者認為派遣使節攜帶貨物以及給皇帝的「貢品」——這是中國的說法——隨同鄭和的船隊返回中國，是一個可行的、明智的權宜之計，大約就不足為怪了。

向海外派遣使節，代表了永樂皇帝以中國勢力向外進行的一次主要試探。當然，永樂所考慮的主要是防禦問題，這就進入了我用以解說永樂統治時期的第二個論點。永樂登極之前位居燕王，並駐守北京為其父親防衛帝國的北邊，所以他對北部邊界非常熟悉，並且他的主要關注是保衛中國對蒙古的防線。當然他也關注保衛沿海地區不受倭寇的侵襲。其中有兩個積極舉動卻是前所未有的。永樂的父親在其誠諭之中明確規定，對於某些國家中國人永遠不得進行干犯。他在一個冗長的清單之中列示了這些國家，其中包括越南。然而永樂的行事卻違背了這一誠諭，他入侵了越南。此舉看起來並不是為了領土目標，而是一種旨在保護王族和王室的特權或權利而進行的干預。

這一舉動的意義，並不僅僅限於他違背了祖訓，而且還在於，這是他對於中國的海外鄰邦的更富進取性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在他兩次把對越南的進犯用作警告之時，這一點就變得明顯了。其中一例是在1407年，即成功地侵入越南的一年之後，永樂向暹羅王送達了一道非常強硬敕諭，其中充滿了警告②。第二個舉動也是在1407年。此前中國派赴爪哇的使節，不幸陷入了這個國家的內戰，使團中有170餘人在戰爭中遇難身亡。永樂聞知此事後大為震怒，於是又遣使發出了一份措辭強硬的敕諭送交給

爪哇國王③。

從這兩個事例可見，永樂堅信：他能夠像干預越南一樣干預其他地方。他當然能夠兌現其威脅，因為鄭和的遠航隊正在東南亞和印度洋上行進。確實，在鄭和到達蘇門答刺和錫蘭的時候，他確實干預了那裏的政局，這非常符合永樂對世界這一地區的態度。例如巴鄰旁地區的中國海盜，就被全部捕獲，並被帶回南京處以極刑了。這樣，永樂就在北方維護了中國傳統的防禦政策，同時又在南方打破了其父不得干犯諸國的誠諭。

現在就讓我們簡要地討論一下永樂皇帝對外部世界的看法的第三個方面，亦即貿易方面。他繼承了其父親把所有貿易都視之為貢納制度的一部分的政策。當然，在海外世界和內陸關係之間，還是存在着差異。在內陸，主要是與蒙古和其他邊境民族所進行的馬匹交易，馬匹是中國所需要的。相應地，中國人則提供各種貨物作為交換，其中大部分是茶葉、絲絹和其他紡織品，還有一些中國製造品。

但是在南方，對於海外，就並不抱有經濟目的了。這也是《河殤》的作者們所提出的問題之一。南方並不能為中國經濟提供任何真正重要的東西。大部分貨物被描述為奇珍異物。也有些中國所需要的東西，例如胡椒、稻米和各種香料，但其數量並不很大，並且中國經濟肯定是不依賴於它們之中的任何一種。但是中國的北部前線的防衛，卻依賴於對足以補充軍需的馬匹的購買。中國從來不能畜養出足數應用的馬匹。

永樂統治時期的第四個方面更為有趣。隨着中國與其鄰邦關係的日益發展，宗教問題就經常是十分重要的

了。中國人就其宗教而言是一個非常混雜的民族。他們從印度引入了佛教，加以改造，使之具有了許多中國的特徵；他們信仰道教，這是在本土發展起來的；這裏還有儒教，它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宗教，但對於中華民族的心態影響巨大。但是，他們總是把所了解的宗教與政治和國防聯繫起來；就此而言，有兩種宗教對他們頗為重要。其中之一是喇嘛教。非常奇怪，來自西藏的喇嘛教對蒙古人有着巨大影響，所以未能被中國人改造的這種佛教形式，就頗為永樂皇帝所關注。他和他的父親非常注意蒙古人是如何對待來自西藏的喇嘛的，並且有意識地利用喇嘛教的僧侶來對付蒙古人。

但重要得多的是伊斯蘭教。毫無疑問，唯一能夠對中國造成威脅的宗教，就是伊斯蘭教了。在那一時期，伊斯蘭教非常強大，它是中亞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的宗教，並流行於印度廣大地區。來自中亞的各國突厥族征服者，把伊斯蘭教帶到了北印度；繼之其後的是莫臥兒人，他們也是穆斯林。伊斯蘭教是中國人有必要了解的一個國際勢力，中國人也對之非常注意。鄭和是一位穆斯林，這可能也不是偶然的。許多身居宦官的顧問，以及永樂宮廷中其他一些協助處理國際事務的人，也是穆斯林。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元朝在中亞建立的蒙古治下的國際關係格局的產物，這種格局把如此之多的穆斯林帶到了中國。中國對穆斯林的任用，是應付伊斯蘭教對中國邊境的威脅的一種非常聰明的方式。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永樂對這一宗教本身有很多了解或關心。與之同理，對於喇嘛教，永樂及其朝廷當然也不是對其內容表示欣賞。永樂

皇帝所重視的，在於如何去對付那些主要的伊斯蘭國家，特別是帖木兒建立的帝國及其繼承者。

永樂處理鄰國關係的心態

在對中國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這一問題進行考察之後，我還打算對國家之間的平等問題作出探討。

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涉及中國人對於世界知道些甚麼。可以從兩個層次上審視這一問題。在第一個層次上，中國人從宇宙論和抽象的、普遍的方面觀察世界。然而在另一層次上，中國人也在腳踏實地地搜集其使節曾經涉足的那些國家的信息。由鄭和的西洋之行而產生了兩部重要著作，即馬歡的《瀛涯勝覽》和費信的《星槎勝覽》。還有一些以這兩部書為基礎的其他著述，以及其他一些關於中亞和西域的著作，它們依據的是派赴吐魯蕃、撒馬爾罕以及伊朗和阿富汗的城市一類地區的使節的報告。這些報告所涉及的主要是伊斯蘭教地區。甚至在鄭和越過了印度的航行中，中國人所遇到的主要也是伊斯蘭民族。

與上述方面相關的，是永樂皇帝對外國統治者的觀念。這涉及通過貢納關係而形成的關係等級問題。儘管在宇宙觀這一層次上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的看法，強調中國對外部國家一視同仁而決不厚此薄彼，但是皇帝對於各個國家的待遇，依然有所差別。

永樂皇帝有時決定把御制的題辭或詩章送達他認為是特別重要的君主。我們至少已經知道四份這類題辭和詩章，都是為海外王國的君主而作的。其中第一份於1405年寫給滿刺

加，第二份於1406年寫給日本，第三份於1408年寫給汶萊，最後一份則是在幾年之後的1416年寫給柯枝——南印度馬拉巴海岸上的一個小國。這些題辭大部分相當禮貌周到，它們代表了永樂要求那些君主的忠順的方式。其內容或各有不同，但其大旨則都是說，皇帝在期待着某種程度的忠順，和對明帝國的世界地位的尊崇。

然而與傳達給海外君主的那些辭語形成對比的，是送至內陸伊斯蘭國家的那些信件。約瑟夫·弗萊徹教授在一篇討論中國與中亞的關係的文章之中^④，指出永樂皇帝對於其北方和西方的君主抱有相當現實的態度。一封在1418年送交帖木兒帝國（以阿富汗的哈烈為中心而建立的穆斯林突厥帝國）的君主沙哈魯的國書，顯示了永樂已認識到不能以壓人一頭的態度對待穆斯林帝國，因此其措詞頗為謹慎小心，並且承認了一定程度的平等關係。弗萊徹使用了這封國書的波斯文本，這一文本顯示了中國人已經意識到外交技巧的必要了。這一點也見之於禮品往來之中。中國人的禮品附有永樂本人所表達的敬慕之意。

弗萊徹之所以使用波斯文本，是因為漢文文本已經不復存在了。弗萊徹深信，永樂的顧問完全了解穆斯林國家的勢力。中國的對外關係之中，總是存在着一種雙重做法。以波斯文保存下來的信件是提交給穆斯林君主的。當信件被譯為波斯文時，它使用了外交語言，以使帖木兒帝國的皇帝能夠接受。但這未必是永樂皇帝認為作為天子應該發出的那個文本，當然也不是他希望記錄於官修史書之中的那個文本了。在對他的所有國書和信件加以考察之後，這一點就變得十分明顯了。這位皇帝的所有保存至今的

國書，都流露着優越的口吻。固然這也是一種邀歡於人和屈尊俯就的混合物，但貫穿於整個內容之中的，依然是明顯的自大腔調。遺憾的是，送達沙哈魯的那封波斯文的信件，是永樂的國書被譯為它種文字的唯一保存至今的一例。

永樂皇帝在與對其帝國並無威脅的海外王國的君主們通信之時，他就決不可能這麼講求外交技巧了。事情很有可能是這樣的：既然信函的原件語氣禮貌，接收並翻譯這些信函的中國官員就每每以一種對天子極端虔敬的語言來轉達這種禮貌。而當向外國君主發送信函之時，如果有關的官員認為有必要壓低措辭的傲倨腔調以維持與那些國家的友好關係，那麼與上述相反的情況，確實也同樣有可能發生。換句話說，專職官員通常能夠理解朝廷所要求的辭令與實際外交關係中的現實之間的區別。隱藏在貢納關係背後的這種現實主義態度，在明清那些固守教條的理學家中寥若晨星，但在專門處理外交事務的專職官員那裏卻可以發現。

我們對永樂皇帝的外部世界的各個方面的敘述。至此還缺少一個他個人的方面。在進入本文的下一部分之前，對他個人且略做介紹。我們知道，儘管永樂受過儒家教育，但他主要是被訓練成了一名軍人。在其少年時代他父親保證了他的延師授業，但由於他並非皇儲，所以他的儒學素養可能並不怎麼深厚。他集中學習軍事技藝。作為燕王，他的大量歲月在北方作戰，保衛北京和鎮守北部邊陲。無論如何他對父親極為崇拜，至少史料如是說。尤其在對付他的侄子及其官僚、在侵犯越南和在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之時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推測

他必定是一個果敢強悍的人。例如，他曾經數次親自率兵北征。他也非常豪奢，在傾其國庫修建宮室都城和供給征伐上決不遲疑。確實，就是由於他的巨額靡費，才導致了他的兒子和孫子統治時期儒生官僚反對向印度洋繼續派遣遠航船隊。在某些方面永樂還是與其父不同。我已提到過他對越南的侵略，而這是為其父所禁止的，他還在朝政中任用宦官，委之以干政的權柄，使之居於近側，這也與祖訓格格不入。確實，承擔顧問之責的宦官幾乎參與了一切政務。事實上，鄭和本人也是一名宦官，因寵遇之深而受命總領西洋之行。關於永樂的少年時期頗多逸聞野史，特別是對其生母是誰有種種猜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其父親那裏並無異寵，卻又以反叛手段篡奪了其侄子的皇位所致。但不管其母是否是一名穆斯林，也不管她是蒙古人還是朝鮮人，這對於解釋他後來的作為都無幫助。他的才藝使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大而獨特的影響，然而這也造成了他不少的錯誤。

與前代中國皇帝比較

下面我打算從各個方面對永樂面對的海外世界和內陸世界加以對照；同時也準備用一些篇幅，考察永樂與別的皇帝在應付這兩個不同世界時的行為差異。

中國朝廷在處理對外事務時所使用的辭令是以正統理學思想為基礎的。明朝把朱熹對經典的闡說作為科舉考試的歸依。在整個明代以及清代，這都是一個強大的思想學派。這一正統學派所提供的，基本是一種對

於世界的內向性視角。其所強調的，是賢人治下的德政，是帝國的穩定，是一個農業國家的基本需要的重要性。明朝在許多方面都充斥着眾所周知的那些理學正統的老套常談。這種正統思想的最為明顯的例證，可能就是它對於外部世界的態度了。例如，禁止中國人到海外旅行，禁止到中國境外進行私人交易，對商業活動實施非常嚴厲的管制。對與外國人進行交易的禁令特別地嚴厲。朝廷及其官員壟斷了所有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和所有有關外交事務的知識。這些都屬於最高官員和國家的事務。至於其餘人民對於外部世界的了解，則對之從來沒有過任何形式的鼓勵。

永樂與此前的中國皇帝相比，其活動有何不同呢？漢代、唐代以及時間上有所重疊的宋元時代，都是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的重要時期。在漢代，帝國的軍隊深入到了中亞，跨過了今日屬於蘇聯的穆斯林地區的中心。在那裏他們有勝有負，但是在漢廷進入亞洲的那一廣闊的戈壁與曠原地區之時卻毫不猶豫。作為對比，漢人對海洋卻相當消極，因為他們的南向挺進僅僅到達了中國的南部海岸。印度與東南亞的商人來到中國海岸進行交易。但是，漢朝的皇帝看來並未採取積極步驟去鼓勵或加強海外聯繫。漢朝傾覆之後，六朝時代的南方沿海省份對印度發生了某種興趣。其原因，應該歸之於對佛教的廣泛接受。一些中國人確實曾經前往印度朝聖，其中不少人是取道海路的。但這一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從南中國取道中亞前往印度的陸路，已經完全地斷絕了。江南五朝通往外邦的通路是海路，那麼轉而取道海路就是非常自然的了。前往印度的佛教朝聖者不僅乘

坐中國船隻，也乘坐外國船隻。

在另一個帝國擴張的重大時期唐代，中國軍隊再次深入了中亞，進入了突厥人的地域和西藏的腹地。他們向北比明朝皇帝滲透得更遠。永樂皇帝對蒙古的所有征討從來沒有超出過長城以北幾百英里，而唐朝軍隊則達到了今日的蒙古共和國，並進入和越出了新疆。像漢朝一樣，唐朝也是在內陸地區頗能進取，在海洋方面則頗為消極。但應記住這頗為有趣的一點：無論是在內陸還是在海上，唐朝都是與伊斯蘭世界相接觸的第一個王朝。伊斯蘭教在中東廣為傳播不久之後就組建了伊斯蘭軍隊，並開始向中亞擴張，因之唐朝軍隊與穆斯林軍隊在八世紀中葉首次發生了衝突。唐朝的軍隊被擊敗了。在此之後，伊斯蘭勢力日見強盛，而唐朝則在其擴張面前轉取退守之勢。在海洋方面也是如此，在穆斯林扮演了一個日益活躍的角色之時，中國人的消極態度依然故我。繼印度人和波斯人之後，新皈依伊斯蘭的阿拉伯人與日俱增地進入了東南亞，並從那裏到達了中國海岸。

宋元時期的中國一方就較為衰弱了。中國要對付契丹和女真，但最終是蒙古成了它的主要敵手。元朝本身當然是一個蒙古王朝，它建立了遠及歐洲的蒙古統治秩序，並為馬可孛羅兄弟這樣的歐洲旅行家開闢了通往中國的商路。然而，女真帝國切斷了宋朝的陸上貿易。那一地區只能進行一些零星微末的交易了。所以宋朝轉向南方，轉向了海洋方向，並且我們再次看到，由海路抵達中國的人又有增多之勢。但與前此不同的是，這一次中國對海洋表現了積極的興趣，主動與較此前的中國歷史上為數多得多的國家建立了貿易關係。已經歡迎過其

陸上的穆斯林盟友前來中國的元朝蒙古人，進一步去鼓勵由海路而來的穆斯林來進行海上貿易。在十二和十三世紀，中國人關於海外國家的知識日增月進。宋末有趙汝適的《諸蕃志》，元朝有汪大淵《島夷志略》，以及《真臘風土記》這一名著，其作者周達觀曾任中國派向真臘的使節。後一著作頗富現代意味，它非常詳盡地記敘了中國使節的見聞，並且是那個時代的最為生動的記錄之一。還有《大德南海志》的殘本，它使我們對蒙古人關於中國的海外聯繫的強烈興趣得以有所了解。

因之，當明朝定鼎之後，它就繼承了所有這些對於南向的知識和興趣。但是，如果與此前的那些大帝國相比，明朝在內陸較漢朝、唐朝和元朝軟弱得多——它們全都沒有永樂本人在長城沿線所面臨的同類問題。因此，在永樂的繼承者們發現蒙古人太難對付的時候，他們就在越來越高的長城背後採取了鮮明的防禦姿態。作為對比，此前所有偉大的皇帝就都對北方和中亞進行過相當勇敢無畏的、甚至是失之魯莽的征伐。

然而，鄭和下西洋卻是此前的時代無可比擬的。明朝在內陸方面是軟弱的，在北方和西方沒有甚麼新鮮之舉。其新鮮之舉是在海洋方面做出的。可是到了永樂的統治末年，幾乎所有的帝國軍隊都集中活動於北方，在海洋方面則是全面退守。在整個長城沿線上，蒙古人的威脅被認為是如此地嚴重，以致於在永樂之後的120年中，與海外國家的所有聯繫都完全陷於停頓了。在1449年蒙古軍隊兵臨北京城下之後，尤其是如此。自此之後，明朝再也沒有真正恢復元氣。它只是在蒙古人的壓力面前以守土自保

來打發歲月而已。中華帝國在此前所遵循的模式，是在內陸的通路斷絕之後就轉向海洋。但是，儘管永樂造成了在此後與西方建立海外關係的巨大可能性，那種可能性卻只不過是曇花一現。中國人退縮不前了，並且再沒有正式地走向海外世界。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時地大致關閉了陸地與海洋之門。

永樂在1424年去世，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國與其周圍的各個民族的日益隔絕。此後的明代歷史之中，幾乎在人類所努力的每一個領域之內，都是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表現了更多的主動性。

1644年滿族對中國的征服，帶來了一個令人回想起漢朝和唐朝的內陸擴張階段，但是王朝對海外世界的興趣依然是微乎其微，沒有任何舉措可以構成抵禦十九世紀西方海軍的兇猛進犯的預先準備。400年前永樂的海軍遠航隊以及他們的業績，幾乎完全被人遺忘了。

面對的三大宗教世界

在作出結論之前，我還想對十五世紀前半葉的外部世界、特別是海外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看法，做一簡略討論。讓我們把注意集中於三個不同世界之上。基督教世界離中國太過遙遠，並且還沒有準備轉向海洋。它自己也是封閉的，並且教皇的權力分割和西歐的百年戰爭，極大地削弱了它抵禦銳意進取的穆斯林土耳其人的能力。奧托曼土耳其帝國擴張到了中歐，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預告了穆斯林勢力在地中海和歐洲中部與東部此後兩個世紀的支配地位。只有

英國與葡萄牙身居那一爭鬥之外，相對較少地涉身於大陸的戰事。幸運的是，這兩個國家都有海洋可資利用。海洋變成了歐洲人走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徑了。葡萄牙人，隨後是受任於西班牙的哥倫布，英國人、荷蘭人，不久就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海上探險了，這決非偶然。

第二個是印度—佛教世界，它對中國頗多了解，但在那時非常軟弱。印度的北部國家被穆斯林突厥人所征服，而印度人則在整個次大陸上維持守勢。只是在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其陸上部分，佛教諸國還得以自我維持。然而那裏的島上諸國，航路依然暢通，穆斯林與中國的船隊佔據着優勢，並且逐漸地，流行於舊日的印度—佛教傳統大為衰落了，即便不是絕迹的話。唯一的另一個與中國利害攸關的重要佛教地區，是西藏。它的以喇嘛教形式出現的佛教，提供了對付蒙古人的工具——蒙古人是不甚牢靠的信徒，但又是中國最為直接的敵人。由於這一原因，在地緣政治上西藏就成了一個對中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地區。蒙古人信奉了喇嘛教而不是危險得多的伊斯蘭教，對中國來說這真是幸運。但是，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部世界看來，喇嘛教都主要是一種與世無爭的，或最多是對世間紛爭淺嘗輒止的事象。

在中國人眼中，無論在海上還是在內陸，伊斯蘭教世界都是最為強勁的潛在威脅。這種宗教是中國人所了解的外部世界之中的主要力量，所以對於永樂皇帝來說，這也是一個可怕的世界。因此，永樂要任用穆斯林擔任其使節和顧問，要對帖木兒帝國和其它穆斯林帝國表示尊敬，要把一位穆斯林任命為派往印度和中東的遠航

隊的長官。在那一時期，從軍事上看，在陸地上中國與蒙古人和穆斯林人旗鼓相當，但在海上中國確實就勝其一籌了，雖然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較之中國人毫不遜色。然而在貿易方面穆斯林卻更為自由，並不受陳腐的農業意識形態的束縛。就宗教而言，穆斯林具有更為強烈而狂熱的信念，給了他們同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的真主保佑着他們。他們的無所不在的安拉為之提供的辭令，其感召力並不亞於理學。唯一減少了他們對中國的危險性的因素，是他們的四分五裂。如果永樂的七次海軍西洋之行，再加上許多陸上的外交使團，能夠確定政治分裂嚴重地削弱了各個穆斯林勢力並使他們對中國較少威脅的話，那麼遠航的目的就達到了。

結 論

我的結論性評述也很簡短。身居首都南京的永樂皇帝的世界，可以平均地分成內陸世界和海外世界。他在開始其統治之時，同時向北方派出了陸軍和向海上派出了海軍。他的海軍勝利返航，滿載榮耀，並證明了在那一方向對中國並無嚴重威脅。他對越南的侵略是一次小仗，並且也以勝利告終。作為對比，他的北部防線卻依然是如此地險象頻仍，並且年復一年地勞人焦憂，以致於他感到有必要親自率兵征討，以致於遷都北京看來就成了明智和必要之舉，這樣才能更接近於那個更需要加強力量的地區，這樣才能更好地管理和組織那裏的防務。由此，部分地由於鄭和及其西洋之行，永樂的海外世界，很快就讓位於內陸世界了。

現在，應該回到《河殤》的作者們提出的十五世紀，中國面臨着一個選擇機會，但由於做出了面向陸地或面向內部的選擇，便使得中華文明陷入了不可逆轉的衰微。但是，中國真的有過這樣一個選擇機會嗎？

我業已指出，當永樂在其統治初年同時向海上與內陸派出軍事力量的時候，看起來它是有一個選擇機會。但是到了1409年，在鄭和第二次返航並證明了海外並沒有值得擔心的敵人，以及永樂決定親自征討威脅已久的蒙古諸部之後，這位皇帝就下定了遷都北京的決心。這就等於接受了中國的這樣一種歷史命運：中國的陸上防線總是脆弱多災，其敵人總是來自北方並從內陸威脅着中國，因此其前途就應是面向陸地的。

很明顯，這並不是沿海的那些省份，特別是福建和廣東的居民的觀念，他們經常感到有必要面向海洋。然而福建和廣東的居民，不像葡萄牙人，無獨立地位。明朝時，他們的未來開始是由南京，後來是由北京決定的。儘管鄭和的西洋之行必定也曾激起過深切的期望，但是這兩個首都都不鼓勵他們去向大海尋求未來。遷都北京以集中對付中國傳統的陸上敵人，就是承認了中國別無選擇而只能如此。隨之而來的是，福建和廣東也就同樣地沒有選擇可言了。我們當然都免不了要猜想：「假如鄭和為中國帶回來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海外世界圖象，那麼永樂會作怎麼樣的決定呢？」或者問：「假如福建和廣東對海外世界的看法竟然在明朝朝廷能佔上風，那又怎麼樣？還有甚麼是他們幹不了的呢？」但是，對於這些實質上是非歷史性的問題，不可能有真實的答案。

註釋

- ① 參閱《明太宗實錄》卷十二上。
- ② 參閱《明太宗實錄》卷七十二。
- ③ 參閱《明太宗實錄》卷七十一。
- ④ 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哈佛大學出版社，1968，頁209-216。

(閻步克譯)

王慶武 1930年在印尼出生，在馬來西亞長大，其後赴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就讀，隨因時局劇變，轉讀馬來西亞大學，獲學士、碩士學位，1957年赴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其後歷任馬來西亞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講座教授兼系主任及該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院長、澳洲人文學院院長。1986年王博士來港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王校長是五代史和海外華人歷史的專家，主要著述包括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東南亞與華人》、《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等等。